

教育：首先应着眼于人力资源的开发

Education : Emphasis should be Laid on Human Resources Exploitation

俞新天

(上海社科院亚太所所长, 副研究员)

一、人力资源比自然资源更宝贵

对历史稍感兴趣的人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经济崩溃,满目疮痍,工厂夷为平地,城市变成废墟,一片碎石破瓦。人们曾要求经济学家估价战争损失对战后恢复的影响,结论是仅仅清除瓦砾就需要 30 年时间! 结果不到十年,它们就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并开始了新的飞跃。现在,我们很自然地会发出疑问,何以估计与实际情况有天壤之别? 曾参与估价工作的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检讨认为,误入歧途的原因是过于重视非人力资本,而忽略了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推而广之,人们往往以为土地广袤肥沃,资源丰富多采的国家,更容易走上发展之路。但是,二战后成功的新兴工业国(地区)却都为土地狭小,资源贫乏的处所,亚洲四小如此,以色列更有一半国土是不毛之地的沙漠。可见现代新科技与新技术,已经明显改变了传统的竞争优势。

绿色革命对所有的国家都影响深远,少数人耕作已可满足大多数人的口粮,甚至供过于求。材料科学的革命降低了人们对天然资源的需求,而且还会迅速减少对稀有天然资源的使用。实际上缺乏天然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在 21 世纪可能成为更有利的背景。日本既无铁又无煤,钢铁工业却最发达。或许正因为缺煤缺铁,日本便无需受制于价高质差的本地矿源,反而向外购买价廉物美的原料。

拥有天然资源并非致富的保证,缺乏资源也不意味与富裕绝缘。日本、亚洲四小和以色列无资源而富,阿根廷、印度、尼日利亚等天赐丰厚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却饱受贫穷饥饿的煎熬。发展的奥秘在于人,它是一切资源中最可宝贵的财富。

可是,发展中世界有的是人,简直人满为患,为何有的龙腾虎跃,有的穷困潦倒? 美国作家威廉·

福克纳在描写一位贫穷的农民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技术和知识,人就无依无靠。”可见有了人,只算具备了人力资源的潜力,欲将潜力化为现实,则须经过开发的过程,即提高劳动人口的教育水准和技术知识水平。二战后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经验,而在科学技术竞争日趋激烈的 21 世纪,它更将成决定性因素。

有的人将人力资源理解为发现和培养人才,前几年我国“人才学”的兴盛也是此种观点的表现。然而这种理解很不全面。人才固然重要,一个天才创立一种新学科,一个能人救活一家企业,但是人力资源的内涵却丰富广泛得多。人才是人力资源中出类拔萃之辈,而人力资源则是人才的深厚基础。人力资源若如壮阔的大河,人才便恰是激起的浪尖。人力资源的开发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有根本意义,穷弱之国当然也会冒出人才,但如孤星,不成气候。英国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比日本多,但是日本在人力资源开发上的努力胜过英国,日本的劳动大军团队整齐,士气高昂,其经济发展的前景更有保证。

二、教育是福利更是功利

开发人力资源的唯一途径是教育。倡导教育似乎是老生常谈,结果人们往往耳进耳出,不以为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将教育仅仅视为福利。什么提高国民素质,培养精神文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一些人眼中,这些毕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还是先抓经济增长要紧,待有了一定积累后再发展教育。这种陈腐观念早已无法适应新科技革命的新时代。

教育对于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功利作用。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发现,工人从较低产业转到较高产业时收入会增加。根据计算,产业间的劳动力转换所造成的收入增长占总收入增长的 40%。那么余下的 60% 难道是飞来横财吗?

当然不是。它来自工人在转换工作前对自己的种种教育投资。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精确算出,美国1929~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有20%归因于教育。他的另一结论也很重要,即在1909~1929年,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教育的2倍,而1929~1957年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超过了物质资本的贡献。而1929~1957年恰值美国经济全面大发展阶段。

二战后新兴工业国和地区都在短时间内实行赶超,其产业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平均每十年上升一个等级,以韩国和台湾最为典型。在1945年摆脱日本殖民桎梏后,它们从只能出口初级农产品和原材料,到建立轻工业,基本满足了国内需要。在60年代后,它们以国内轻工业产品出口,打入国际市场,赢得外汇。70年代后,政府大力投资,实行重工业化,保持了经济增长,并为真正变为先进工业国(地区)奠定基础。80年代中期后,它们又考虑出口的多样化,产业进一步国际化。这种压缩型发展,在短时期内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进而走向知识信息密集型产业,对人力资源的水准需求大大提高。如无迅速有效的教育来支持,急速增长便不可能达到。

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二战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在抓紧经济建设的同时,大量投资于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成本。教育公共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1982年韩国为4.3%,新加坡为4.5%;教育开支占政府开支的比例,韩国为21.5%,新加坡为9.6%,这是亚洲小龙腾飞的深层动力。今日被称为第五和第六小龙的马来西亚和泰国,在70和80年代已经在教育事业上遥遥领先,1982年其教育公共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7.6%和3.9%。

以色列的例子更为醒人。1948年建国时,超过原居民数倍的犹太人潮水般地移入,其中大部分来自较为落后的亚非地区,一时经济不堪重负,濒于崩溃。但1949年新选出的政府却高瞻远瞩地立即颁布义务教育法,对5岁(幼儿园最后一年)至14岁(8年制初中毕业)的儿童实行九年免费义务教育,14岁至17岁未读完初中者也包括在内。整个60年代,以色列教育预算平均占国家预算的11%,达国家总收入的8.5%,仅次于国防部开支。至1978年,随着国力增强,它又将免费义务教育扩大为14年,即2年幼儿园加12年中学小学。由此,大专以上职工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从1963年的12%上升到1979年的26.1%。以色列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兴办了新兴的第三产业,据其经济学家施缪尔·阿米尔判断,主要归功于教育。

由上可见,教育与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功利、因果联系。联合国官员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

现象,许多发展中国家每每制订雄心勃勃的计划,不惜重金购置先进的机器设备,但并未达到持续经济增长的预想结果,关键正在于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没有跟上。相反,有些国家却采取逐渐添置设备的方针,效果反而好些,其原因就在于确保了求实、循序的理性选择和相应提高人力素质的自然过程。由此可见,如果政府自觉地投资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必定会缩短上述自然过程,取得事半功倍的功效。经济学家们也通过计量研究,证明对人力资源的投资至少应达到对设备原料投资的1/8,否则教育的延误会成为持续发展的掣肘。

三、变“小教育”为“大教育”观念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强调的“教育”,决非原来狭义的学校教育,而是包括学龄前教育、职业教育、技术培训、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等的“大教育”观念。在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前提下,教育的设备固然重要,教育的结构和内容的革新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小学的学校教育长期囿于沿袭了几十年的传统模式,无法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也无法培育出工业化社会所需要的广泛人力资源。改变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社会发展脱节的状况,是教育革命的宗旨。一切教育都应当有意识地为此目标服务,当然是有机的而非生硬的,在这方面最值得强调的是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

日本的职业教育起步早,进展快,效果大。早在1951年6月日本国民议会便通过了《工业教育振兴法》,旨在促进职业教育。1952年之后,日本工业家组织日经联连年发表公告,强烈要求纠正偏重普通教育的偏向,极力主张充实职业高中,职业中学多样化,大学教育专业化,增强日本在世界上的工业竞争力。这些报告大大影响了政府政策,多数建议都被采纳。在制订法律时,产业界代表古川电气工业经理西村启造说:“我对理论姑且不谈,我所希望的是全体日本人都成为产业人,能从事劳动的人”。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职业高中是日本职业教育的重点。因为就业者绝大部分有高中以上学历。职业高中包括农业高中、工业高中、商业高中、水产高中和家政高中等。60年代之后,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职业高中课程种类增多,如至1973年共设置了277种学科,其中工业144种,商业66种,农业21种,水产14种,家政15种等等。在工业学科中,机械、汽车、电子、化工、建筑占重要地位,与产业发展趋向相一致。企业界十分欢迎职业高中生,企业的技师和中级技术骨干都从他们中产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研究了1965~1980年的亚洲教育模式后建议,发展中国家应有30%的人接受技术和职业教育。然而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实际

状况远远低于这一标准。亚洲四小和以色列的职业教育比例却比较高。如韩国积极实行教育为工业化经济服务的政策,到1980年,职业高中已占全部高中学校的45%,有15万余名学生到初级技术学院上课。职业学校的专业方向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通讯、电子等成为新兴热门课。在大学和学院中,那些与经济发展相对较远的科系只给很少的招生名额,而其他系科则鼓励多招学生,如工程学、医学、电子学和航空学等等。

教育与现代生产结合的最捷途径是职业培训。从日本与亚洲四小的例子看出,尽管有了完善的职业教育,但是当今工业生产技术的更新很快,专业化程度更高,对职工有更具体全面的要求,职业培训是企业增强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新加坡确定了原则:“先培训后就业,未经培训不得就业”,同时建立了一整套制度来加以贯彻。1975年新加坡成立了工业训练局,专门负责中小学离校人员和在职职工的培训。1975~1989年,该局下属学校开设80多种职业技术训练课程,修业期满可分别获得工业技术证书、国民商业证书、实用工艺证书以及其他教育证书,凭此方可求职。此外,经济发展局、劳工部、职工总会、教育部都设有职工培训中心,推行企业培训计划。政府设立“技能发展基金”,鼓励通过企业培训提高低级技术职工水平。政府与跨国公司联合,定期培训专业技术骨干。培训人员有的交费,有的可先贷款,待工作后归还,方法十分灵活。

韩国政府规定,凡300人以上的公司,都必须制订技术培训计划。私人企业为此大量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结果既有益于企业,也造福于工人。大集团公司甚至成立自己的技术学院,如现代集团和三星集团的学院质量较高,吸引了远近各方企业的职工。由于技术学院并非仅为本公司培养人才,所以其他公司和社会团体都愿慷慨相助。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必须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将有限的教育经费用到刀刃上,大力发展职工教育与技术培训,迅速有效地推动经济腾飞。

四、我国当前目标是浇铸基础 而非建造塔尖

从成功的新兴工业国(地区)的经验来看,在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其教育的起点并不高。恰恰是经济高速发展提出了对人力资源的要求,逼使政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时地作出了富有远见的决策,不断地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将国民经济持续地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这些经验对我国的启示在于,我国已到了非解决这一“瓶颈”问题不可的关键时刻。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即使在教育程度较差的条件下也开始了经济起飞。但在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开始新的经济飞跃时,原先的潜力已经耗尽。后劲从哪里来?只能从开发人力资源中获得保证。各级政府首先要转变观念,重新认识教育对近远期经济发展的全面作用,提高对教育的投资。如果不改变教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排在世界最末几位的状况,而想跳出不发达的深谷便是痴人说梦。还要通过广泛宣传,形成全社会办教育的局面,动员各种社会团体和海外华人,在投资硬件的时候不忘投资人力这一软件,为开发中华民族的人力资源,作出贡献。

资金问题解决之后,更重要的选择是投向何方。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源的开发重点应放在中低级而不是高级层次上。当然我国这样的大国,应当有一定的高新技术和高级人才,但从总体上看,迫在眉睫的是加固基础而非修建塔尖。笔者曾与日本一桥大学南亮进教授讨论我国科技发展目标,他一语中的,主要目标应为提高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不要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它虽有发达的航天技术却不能生产优质的家电,更无法打入世界市场。目前我国进入世界市场的主要还是中低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了增强竞争力,必须提高质量和改进效率效益,二者均与人力资源的质量密切相关。我国现已引进的流水线,但不少产品质量总是赶不上国外同样设备制成的产品,除了体制原因外,人力素质的差异是更主要的原因。有鉴于此,教育的投资主要应流向义务教育、职业高中和技术培训。

义务教育是提高人力素质的基础,目前状况实堪忧虑。“全民经商”的浪潮冲击了义务教育,人们片面理解发展经济的做法,短视的父母迫使年幼儿童辍学从商。原有文盲未扫,新文盲又生。职业培训也是当务之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大量缺少文化的“农村妹”进厂做工,应付眼前生产或许尚可,进一步提高产品档次已不敷需要。国有企业在转换机制时,许多低技术工人被淘汰出来,亟需通过培训提高层次,重新就业。大力增强职业高中更为重要。一定要改变片面追求大学升学率的陈腐观念,为市场输送急需的各种行业的职业高中生。对我国来说,普及高等教育为时尚早,日本直至70年代才转而加强高等教育和研究生培养,在此之前一直强调职业高中,值得借鉴。高等教育亦应改革,向应用学科倾斜,以两年制的职业技术学院取代过多过滥的综合性大学。总之新的教育体制应有明确的针对性和高度的灵活性,以随着经济增长的要求而不断调整。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现代化成功与否取决于人。如果我们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上名列前茅,美妙的未来就向我们敞开了大门。

(责任编辑 蔡德诚)